

若根中去苗未尽,易引起发汗之误。煅龙骨、煅牡蛎是收涩药物,用之不当,便有闭门留寇之患。

重庆市中医研究所 周百川

祝由辨析

“祝由”与巫术、禁咒、祝由科等一样,在很长的时间里,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封建迷信的东西而予绝对的否定。但事实上,“祝由”与后三者,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,不可混淆。

“祝”古有二义:其一为古代的一种官职;其二为巫的一种重要活动方式。巫术的范围是很广的,其中也包括给人治病,而治病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“祝”。它是向鬼神祷告,再转而将鬼神的旨意转达给人,遵照鬼神旨意以达到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。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,生产力水平的提高,巫术和科学分开了。这种分立在医学上是以《内经》的出现为标志的。在《内经》中对“祝”给以新的解释并赋予了崭新的内容。

《灵枢·贼风篇》说:“黄帝曰:今夫子之所言者,皆病人之所自知也。其毋所遇邪气,又毋怵惕之所志,卒然而病者,其故何也?唯有因鬼神之事乎?岐伯曰:此亦邪留而未发,因而志有所恶,及有所慕,血气内乱,两气相搏,其所以来者微,视之不见,听而不闻,故似鬼神。……固知百病之胜,先知其病之所以生者,可祝而已也。”《内经》明确指出,祝其所治之病,其病因似鬼神实非鬼神,是邪留未发,兼之志有所恶,有所慕,其病机是血气内乱,两气相搏,知百病之胜,知其之所以生,因而“可祝而已”。祝者告也,正如《灵枢·师传篇》所云“告之以其败,语之以其善,导之以其便,开之以其苦”,其目的是使“邪不伤正,精神复强而内守也”(《素问·移精变气论》王冰注)。

由此可知,“祝由”就是王冰所说的“祝说病由”,也就是医者通过对病人“祝说病由”以达到治疗心理情志因素引起疾病的一种方法,可以说它是古代一种朴素的心理疗法。古代很多医家,如朱丹溪、张子和、张介宾、吴鞠通等,在治疗情志病中,继承发扬了《内经》的“祝由”疗法,并在实践中给以发展。

《内经》所说的“祝由”,同“有疾病者,对天祝告其由,故名曰祝由科”(宋淳熙著《秘藏医书祝由十三科·序言》)中所说的“祝由”,名同实异,完全是两个概念。其中吴鞠通在其《医医病书》中对“祝由”作了专门的论述:“按‘祝由’二字,出自《素问》。祝,告也,由,病之所以出也,近时以巫家为‘祝由科’,并列于

十三科之中。《内经》谓‘信巫不信医不治’,巫岂可列之医科中哉!吾谓凡治内伤者,必先祝由,详告以病之所由来,使病人知之,而不敢再犯。又必细体变风变雅,曲察劳人思妇之隐情,婉言以开导之,庄严以振惊之,危言以悚惧之,必使之心悦情服,而后可奏效如神,余一生得力于此。”综上所述,可见《内经》中的“祝由”与巫术、咒禁、祝由科等,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,不可混淆,更不可一概否定。

北京中医学院研究生 倪健伟 钟雷

姚僧坦和姚僧垣质疑

《隋志·北周书》中姚僧垣有传。据谢观编《中国医学大辞典》姚僧垣条载:“字法卫,梁·武康人……生平治效甚多,著有集验方十二卷,行记三卷。《北周书》有传。”(见该书1772页)据此中医古籍中之《集验方》和《姚方》应作《姚僧垣集验方》。但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卷一作《姚僧坦集验方》,在正文中,姚僧垣又与姚僧坦互见。姚僧坦与姚僧垣,谅在时珍时已讹。近年来,书刊中不乏沿作《姚僧坦集验方》者,如贾得道著《中国医学史略》(山西人民出版社,1979),《中药大辞典》所引多处,亦均作《姚僧坦集验方》。姚僧坦乎,姚僧垣乎,似有一正之必要。

江苏省启东县吕四镇 孙启明

谈补益与通下之得失

人们欢迎进补,“闻补则喜”。所谓补者,补阴阳、营卫、气血、精津之虚损,脏腑机能之减衰,补偏救弊,但“苟犯其忌,参术不异砒磺,用得宜,确黄可称补剂”。故不可含病惜之虚实寒热于不顾,徒执补剂以迎合,从而酿成药物浪费,尤且贻误病机,害莫大焉!补剂非温热即滋腻,病情需要则用当,无疾滥施,易生火、助湿、滋痰、蕴毒,诱生他变。若更加“膏粱厚味”,醇酒浓茶,恣用无度,恙根夙潜,一旦外邪相引,七情有伤,必致疾发猝然。

与补益相反,人们多“闻攻下则忧”。通下实具深意,临床多验,余素苦便秘,大肠积热蕴毒相因,突发化脓性阑尾炎,几致溃破,手术愈后,便秘复加,因常隔3~5日服木香槟榔丸9~12克,大便缓下2~3次,则腹畅食舒。前人有云“若要长生,肠中常清,若要不死,肠中无屎”,近人有谓“肠以畅为补”,皆经验之论。通下与补益殊途,孰得孰失,宜三思之。

北京西城中医医院 曲博泉